

许多与会代表认为，这次会议是一次成功的大会，成功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新的基础上增进了团结，为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从会议上提出和讨论的问题来看，社会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研究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对具有战略决策意义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引起了社会学界的普遍关注；（3）进一步明确了学科建设的任务与方向；（4）会议始终贯彻了“双百”方针，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表明社会学学科的健康、民主、活泼的学风得到了进一步发扬。

与会代表分析了社会学发展的有利条件，对社会学的发展充满信心，决心用自己的艰苦奋斗开创中国社会学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费孝通的书面讲话

（根据录音记录整理）

我很抱歉，这次会议我不能来参加，我托王志诚同志把我想说的话带给你们，并祝这次会议开得成功！

我想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过去我国社会学发展的大体经过，检验一下我们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在1979年3月召开了有各方面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后来改名中国社会学会），接着着手筹备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之后，用学会名义办了5期学习班，吸引了很多对社会学研究有兴趣和热心重建社会学工作的中年同志参加到社会学队伍里边来，到现在，他们已成为我们的骨干力量。后来，许多省市先后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机关。在我们积累了筹备社会学会和研究所的经验的基础上，又着手筹备成立各大学的社会学系的工作，到1982年基本就绪。我自己也转到具体研究工作上来了。现在，已有12所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还有不少大学设置了社会学专业，不仅有了本科生，还招收了研究生；培养了硕士生、博士生，我自己也做着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目前，在校生已有1000多人，科研人员也近千人，副研、副教授等高级职称的同志也有200多位。

1984年，我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我的社会学工作岗位转到了北大，1985年初在北大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最近，又在中央的支持下，扩大力量，成立了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我个人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小城镇”，这是个乡镇社会发展的课题。到1984年，我又把研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西部边区的开发问题上，就是我常说的下棋要做的两个“眼”。

开始筹建社会学的时候，我们一直遵循着一条原则：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没有背离的原则。我想这一方针应当继续是我们大家今后工作的指导原则，并且结合中国实际，使它得到发展。

回顾过去，加深了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发展乡镇企业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公认，认为是中国农村经济建设的一个必由之路，是我国农民自己创造出的一种工业化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

现在，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即要深化改革。对深化改革紫阳同志又指出了沿海地区

的发展战略。同时指出，沿海地区的发展必然会带动中部，特别是西部地区。我们的边区研究工作，适应了这个形势。由于大家的努力，我们的工作初步取得一些成绩，现在看来，我们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没有离开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方针，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

不久前，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提高马列主义社会学在解决苏联社会的关键社会问题方面的作用的决定》（见1988年6月24日第22702期新华社版参考资料），要加强社会学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在改革过程中，特别需要借重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社会各方面的弊端及其相互影响，能进行科学的分析，使人们在改革的进程中可以比较少地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我们也面临着一个改革、开放的、重要的、关键性时刻。我们也应该用社会学的观点去研究当前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社会学的队伍还是比较年轻的，我们很多老年的同志，有的在这段时间里过世了，而新一代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熟，在社会学队伍里边还存在着新老衔接的问题。我们希望老年同志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更需要的是年轻同志赶快成熟壮大起来，使得中间不发生断层。我们要有个衔接的发展过程。

同时，我也有责任提出，当前社会学队伍里边，由于受不正之风的影响，也发生过一些问题。如，以社会学的牌子为个人谋取私利。这虽只是个别的，但是值得我们警惕。

我们这一门年轻的学科，水平不能要求一致。可是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凭自己的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断追求上进。同时要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特别是在科学研究领域里应当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我们决不能用一种理论、一种学说来包办中国的社会学。我们必须欢迎兼容并包，只要它是科学，就得实事求是，有事实根据。看法可以有所不同，这并不妨碍我们本学科的向前发展。不仅不妨碍，而且会有帮助。否则，会走到思想僵化的路上去。只有我们多讨论、多研究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的看法必须有实际的、事实的根据），不同可以取得一致。假如凭自己的主观出发，不是从自己实际看到的事实里边得到概念，而硬套到我们中国的实际上边去，那是不会取得好结果的。

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自己对社会学今后应当做点什么事。我自己的年龄已近80，我自己现在所担负的国家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了，我确实觉得由我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很不够。我这些年一直希望搞一些研究，但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做研究工作。我很希望大家能谅解我，减少我在社会学领域中具体为大家服务的工作，即让我能解脱社会学学会方面的工作。

1986年在北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学会的改革问题，得到了胡绳同志的支持。他很希望我们社会学学会能带头对于中国的各种学会的体制上有所改革。我们同许多同志一起协商，认为学会是为科学家进行学术活动的服务机构。每个人的学术地位是由他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决定的，不是由学会中的职务决定的。因此，我想社会学学会的组织应该实事求是的简化，精减。应把我们全国性的学会作为联络机构，配备一定工作人员处理日常事务。把实际工作，即社会学研究工作，学术讨论工作放在地方。现在各地方都有社会学学会，让各地方的社会学学会作为一个实际工作的单位，它可以单独活动，也可以联合其它地方学会活动，也可以召集各种专题的、或邀请各地方参加的专题讨论会。一切都要以学术为主，要提出确有研究成果的论文，互相讨论，互相提高，不能为开会而开会，不能为选举理事、选举会长而开会。学会和行政机构是完全不同的，学会应以联络、服务为宗旨。具体组织办法请大家讨论，充分发扬民主。

至于我自己，我已多次表示，我不再担任学会会长职务，不过我还是用我的今后岁月来为社会学工作，作为我们队伍里的一个成员。过去我任会长期间，由于主观上的原因和许多条件的限制，在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尚希大家予以批评指正和谅解。

我一生从事社会学工作，主要是要了解中国社会，为了使得中国更富更强，不能在全世界、这个世界一体、这个世界大社区里，失去我国应有的地位。我的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现在，国家形势对我们要求很高，我感到社会学这个队伍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加强。希望已有的各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志能多培养出能进行调研工作、能接触中国实际、有进行理论分析能力的一代新人。

今后工作很沉重、很艰巨，我自己一定承担我自己所能承担的工作，在各位同志的督促和监督下，帮助我，使我这一点愿望能实现。

最后，我想到明年，1989年是重建中国社会学10周年，各位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开一次有水平的关于社会学的讨论会，我们也可以在这次会议上进行国际交流，使各国都知道我们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用这个会作为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10年的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换届，进行改革，就是说不仅是换届，而且是社会学会的改革。

1988年7月30日

(王志成执笔)

雷洁琼的书面讲话(摘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研究，正在社会科学各科、系积极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这个历史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因此我们必须从我国国情调查研究出发，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认识，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和发展规律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社会学工作者应共同努力，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社会学的理论、观点、方法，将这项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

这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是适时的，各地社会学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交流学术思想，交流研究经验，共同探索，将对这一课题，作出理论的贡献。

祝讨论会圆满成功！